



多哥洛美，“奔驰妈妈”玛吉·劳森在其布料工厂的仓库视察。

获得掌控地位

性别平等可促进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增长

克里斯汀·迪特里希、达利亚·哈库拉、莫尼克·纽伊艾克

多哥纺织工业的繁荣应归功于玛吉·劳森 (Maggy Lawson)，她更被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奔驰妈妈”，因为她本人以及她的妈妈之前都一直驾驶令人瞩目的奔驰汽车，并因此而出名。玛吉·劳森打破传统束缚，继承了其母亲的生意并于 20 世纪 70 年代作为商界女强人一举成名，她公司的主要业务是销售西非各地制造成衣所需的色彩艳丽的印花棉布。她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为当地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

女性也能够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带来积极影响，“奔驰妈妈”仅是许多这样的成功女性中的一位。

性别不平等和经济产出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研究表明：更加强劲的增长会推动性别平等，而性别平等反过来也会促进增长 (Duflo, 2012；见图 1)。

性别平等可促进增长，这一点我们有很多佐证。弥合全球范围内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会对全球人力资本产生巨大推动并降低收入不平等 (Gonzales 等人, 2015b)。

与男性相比，女性倾向于将更多家庭收入用于其子女和孙辈的教育，这样一来，弥合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转化为更高的儿童入学率，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率。而且，劳动力人口中女性比例的提高意味着会出现更多有能力的劳动者和企业家。

人口结构转变的加快会降低需抚养儿童的人数，这有利于降低不平等程度，尤其对于那些低收入家庭，同时增加了女性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投入 (Soares, 2005；Soares 和 Falcão, 2008)。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更高，反映出女性需要工作以维持生计的现实，但工作机会通常存在于劳动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而且多为非正式就业部门。工薪就业依然是由男性所主导的领域，这种情况限制了人才的高效利用。

上述种种不平等状况在其他地方也有所反映。根据联合国用以衡量劳动力市场、死亡率和生育率、教育和授权赋能方面不



平等程度的性别不平等指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许多国家在某些方面的不平等程度居全球之首，马里和尼日尔尤为突出。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较为严重。在过去的15年中，该区域的快速发展提高了人均收入，贫困率也出现下降。不过，人口中的收入分化现象依然存在，而且在许多国家日趋严重，使该区域成为全球仅次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收入不平等最为严重的区域（见图2）。收入平等程度的提高会刺激经济增长，因为低收入家庭能够增加投资于教育和体育的资本。同时，收入平等程度的提高也会降低社会政治不稳定性并提高治理能力，而治理能力不佳会抑制民间投资（Barro, 2000）。

代价高昂的不平等

鉴于该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程度均较为严重，同时考虑到上述不平等在全球各地都对增长起到阻碍作用，我们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何种程度的不平等会危害该地区的经济繁荣。

尽管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别，但潜在的危害是巨大的。我们的研究发现，将收入和性别不平等程度降低至目前迅速增长的东南亚经济体（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水平，可以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均年实际GDP增长率平均提高将近1个百分点。这种程度的增长对年人均GDP增长的影响相当于弥补了过去的10年中上述两个地区之间的基础设施差距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特别强调了对抑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增长潜力的不平等性的驱动因素。许多此类驱动因素对性别不平等程度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方式是相似的。实际上，性别不平等本身也加剧了部分收入不平等。

我们的研究也证实，机会的不平等（机会是指帮助人们达到其全部经济潜力的初始条件和资源的可得性）可解释很多收入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现象。例如，缺乏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和基本基础设施服务的机会会限制人力资本的开发并降低效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尽管已经普遍的得到改善，但该区域的许多国家依然落后于其他地区具有相似收入水平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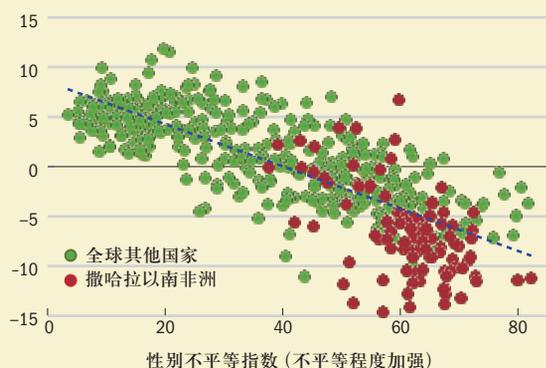
女性的机会也得到了普遍改善，但还不够。例如，自世纪之交以来，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推动下，男性和女性小学录取率都得到提高。但是，女孩和男孩的小学或中学录取比例为91:100，而高等教育中女性和男性的录取比例为73:100。造成上述差距的原因从缺乏基本基础设施——意味着（主要是女性）需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活动——到较高的青少年生育率和早婚率不一而足，后者使女孩子在年纪尚小时便为家务劳动所累。例如，在尼日尔，每1000名年龄在15—19岁之间的女孩子的生育次数超过200次，而仅有15%的女孩子能够进入中学读书。

类似地，女性在获取金融服务方面也不及男性。近年以来，在金融机构开立账户的人口比例有所增长，但男性比例仍高于女性。在肯尼亚等一些国家中，基于移动电话的账户已经超越了传统银行账户，这有助于弥合不同收入群体获得金融服务方面的差距，但获得移动银行服务方面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性别差距。在肯尼亚，62%以上的男性拥有移动账户，而拥有此类账户的女性比例不足55%，

图1
更加平等，更快增长

严重的性别不平等似乎在阻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增长，即便在考虑到各国发展水平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联合国性别不平等指数和非由发展水平决定的人均GDP增长，1990—20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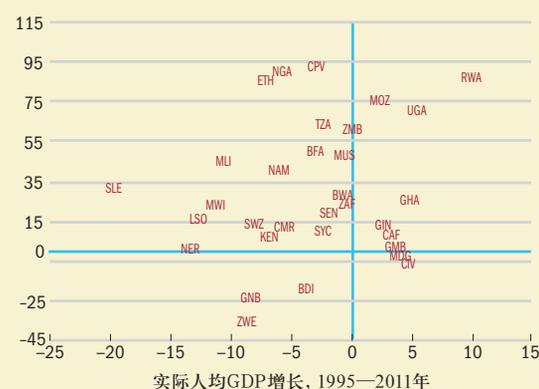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IMF员工的预测。
注：保持正增长国家的增速超出其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而那些出现负增长的国家的增速更为缓慢。

图2
严重的收入不平等

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增长强劲，但不平等程度下降甚微且各国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用以衡量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的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Solit (2014)。
注：变化出现在1995年（或下一个最早数据可得年份）和2011年（或最近数据可得年份）之间。图中的数据分类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家代码。

这限制了新技术所带来的益处。

为女性创造的机会有助于降低不平等的程度并释放该地区的成长潜力。

此外，针对妇女的经济活动依然存在着众多法律限制 (World Bank, 2015)，这阻碍了女性去正规机构存款以及为业务活动借款。上述限制造成了该地区的一些国家高达5个百分点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差距 (Hallward-Driemeier 和 Hasan, 2013; Demirguc-Kunt, Klapper 和 Singer, 2013; Gonzales 等人, 2015a)。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8个国家依然存在着10个甚至更多此类限制，比如妇女在开立银行账户或开始从事一项新工作之前需获得其丈夫的同意。

解决问题

针对低收入家庭和为女性精心设计的政策干预为其创造了一些机会，这有助于降低不平等的程度并释放该地区的成长潜力。

家族型企业对提高女性收入并增加其收入的多元化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女性获得工资就业机会障碍重重的情况下。目前，针对家族企业征收的各种税费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通过财产税改革为地方政府开辟更多的财源可以降低家族企业的负担。

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有助于解决收入和性别不平等这两个问题。例如，如果征信机构具备统一管理的信用记录，并可更加便捷地提供有关潜在客户的信息，银行为新客户提供贷款的可能性就更大。手机银行等新技术的发展有助于为边远地区和女性提供金融服务。

废除在经济活动方面重男轻女的法律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同时简单易行的促进增长的方法。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已经采取措施为女性建立公平竞争机制。例如，1996年，纳米比亚清除了许多针对女性的法律障碍，在之后的10年中，该国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提高了接近8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年中，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修改了其法律以促进平等。例如，几内亚的新劳动法目前包括一项性别无差别待遇条款，肯尼亚有关婚姻财产的新法律也赋予了夫妻双方管理共同财产的平等权利；而根据当前的南非法律，需要做到“同工同酬” (World Bank, 2015)。

最后，水电供应等基础设施的改善直接对增长产生影响，同时，还将通过增加女孩和妇女在教育 and 市场活动中的参与时而间接地促进增长。这意味着人力资本的壮大，同时也为劳动力市场输送各种技能。在加纳开展的微观调

查的证据表明，如果女孩用于打水的时间缩减一半，其上课出勤率会平均提高2.4%，这种情况在农村地区更加明显 (Nauges 和 Strand, 2013)。

上述措施能够显著降低地区内的收入和性别不平等的程度，并对两个本身极为重要且为可持续经济增长起到重要驱动作用的目标提供支持。特别是，这些举措有助于开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女性的联合力量，为造就像“奔驰妈妈”那样的成功者铺平道路。■

克里斯汀·迪特里希 (Christine Dieterich) 和达利亚·哈库拉 (Dalia Hakura) 是IMF非洲部的副处长，莫尼克·纽伊艾克 (Monique Newiak) 是该部的经济学家。

本文基于IMF 2015年10月的《区域经济展望：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章，以及即将发表的IMF工作论文“*Inequality, Gender Gaps and Economic Growth: Comparative Evidence for Sub-Saharan Africa*”，Dalia Hakura、Mumtaz Hussain、Monique Newiak、Vimal Thakoor和Fan Yang著。

参考文献：

- Barro, Robert J., 2000,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5, No. 1, pp. 5–32.
- Demirguc-Kunt, Asli, Leora Klapper, and Dorothe Singer, 2013,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Leg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416* (Washington).
- Duflo, Esther, 2012, “*Women Empower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50, No. 4, pp. 1051–79.
- Gonzales, Christian, Sonali Jain-Chandra, Kalpana Kochhar, and Monique Newiak, 2015a, “*Fair Play: More Equal Laws Boost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5/02*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and Tilek Zeinullayev, 2015b, “*Catalyst for Change: Empowering Women and Tackling Income Inequality*,”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5/20*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Hallward-Driemeier, Mary, and Tazeen Hasan, 2013, *Empowering Women: Legal Rights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in Africa* (Washington: World Bank).
- Nauges, Céline, and Jon Strand, 2013, “*Water Hauling and Girls’ School Attendance: Some New Evidence from Ghan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443* (Washington).
- Soares, Rodrigo R., 2005, “*Mortality Reductio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Fertility Choi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3, pp. 580–601.
- , and Bruno L.S. Falcão, 2008,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6, No. 6, pp. 1058–104.
- Solt, Frederick, 2014, “*The 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Working Paper. SWIID 5.0, October*.
- World Bank, 2015, *Women, Business and the Law 2016—Getting to Equal* (Washington).